

国民党四大家族后人：回避“豪门”背景

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 会，民国“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首上海。

一个甲子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陈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来自“四大家族”，却刻意回避“豪门”背景。对于先人功过的种种争议，他们也坦然处之。

时过境迁，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常常只是衣香鬓影；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浮出水面，显族神秘的历史正逐渐丰富与充实。

宋家：故纸堆中还原历史

从宋美龄住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国出生，中文流利的已是凤毛麟角。

“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座城市——上海，这座城市曾是我的家族生活的地方。尽管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先生是海南人，但在上海，在这座他出生的大都市，他成为中国20世纪很有能力的金融家和政治家之一。我很感动，今天能有这么多全世界知名学者，在上海济济一堂，讨论宋子文先生。”2006年6月19日，身材高大的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 MichaelFeng 用英语为“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致开场白。

作为宋家亲属代表，带着两个儿子从纽约飞抵上海的冯英祥，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ShirleySoong)的出现无疑成为亮点。冯英祥父子均出生在美国，因为不懂中文，父子三人需要依靠同声传译来理解与会者的表达。

宋子文期盼叶落归根

宋氏家族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宋子文(T.V.Soong)的父亲宋耀如担任传

教士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母亲倪桂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宋子文大姐宋霭龄为孔祥熙夫人，二姐宋庆龄为孙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龄为蒋介石夫人，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和总务司长、广东省政府委员，长期担任宋子文发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总经理，还担任过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实业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过国货银行、广东银行董事，较少参政。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有3个女儿，分别为宋琇颐、宋曼颐 and 宋瑞颐，49岁的冯英祥是宋子文长女宋琇颐的儿子。宋子文的9个外孙中只有冯英祥与兄弟冯英翰住在美国，他们的其他表兄弟住在香港和菲律宾，故而孙辈中，冯英祥与宋子文最为亲密，他从小跟外祖父宋子文生活，直至14岁。每逢放暑假，冯英祥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在纽约的生活很简单，他吃的东西、用的车子都非常一般。外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早起，吃完早饭后他就直接去办公室。他很喜欢散步，通常午餐以后散步一小时，外祖父不多的娱乐方式是与他的朋友一起打扑克牌。”

像普天下所有的外祖父疼爱外孙那样，宋子文非常疼爱冯英祥。让冯英祥印象深刻的是，10岁那年，有次他放学回家，感觉到有几个外国男孩一路尾随并盯着他的钱包，被吓坏了的冯英祥奔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刚好是外祖父宋子文接听。“外祖父叫我不耍动，5分钟之内，他就带着秘书开车匆匆赶来，他居然还带了一把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准备来救我！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在讲述这段

经历时，西装革履的冯英祥做了个手枪瞄准的手势，笑声爽朗，神态如同调皮小男孩。

在家庭成员宋曹琍璇的描述中，大伯宋子文不太喜欢讲话，但很有幽默感，他喜欢跟老朋友聊天，喜欢喝酒，拥有很好的格调，是一个美食家。阅读了宋档后，宋曹琍璇逐渐理解了大伯宋子文，“他更像一位 deepthinker(深思者)，虽已退休、身处美国，我相信他的头脑中并不会忘记那种使命感，所以他在生活中仍经常思考国家的处境。”一身旗袍的宋曹琍璇看来温婉大方，颇具风范。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次子宋仲虎(LeoSoong)的妻子，“蒋夫人也曾说，宋子安是最让人喜爱的孩子，因为他最小也最听话，哥哥姐姐们也很珍爱他，宋庆龄在德国时也是带着我公公跟她一起住。哥哥姐姐之间有纷争，我的公公也承担着沟通的桥梁作用。”

1975年，冯英祥就读于宾州大学时，外祖父宋子文业已辞世，那时的冯英祥开始对外祖父的历史感兴趣。他攻读了政治学，“选择政治学也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目前，冯英祥在瑞士信贷银行从事管理，与父亲冯彦达一样，他选择的事业是与银行相关的理财投资规划。

他从未看重自己来自一个像 SoongFamily(宋家)这样的家庭。“我继承的是父亲的事业，其实跟母亲所在的宋家并没有什么关联。经过五六十年后，在美国的企业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来自 SoongFamily，更重要的是要靠个人后天的努力。”

关于宋子文富可敌国的猜测曾让这个家庭的后代备受压力。但在冯英祥看来，外祖父宋子文生前很沉默，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关于财产的事情，

他的遗产是一些美国股票，让所有的孩子平分。

冯英祥也强调，与外界传言不同，外祖父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感情非常好，兄妹间有很多通信。“即便1949年以后外祖父宋子文在美国，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他们晚年身体不好时，宋子文会积极帮他们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物，并把医生送到台湾让他们替蒋介石看病；宋美龄每次到纽约，哥哥宋子文也会替妹妹找当地最好的医生。”

身处异乡的宋子文生前仍然期盼叶落归根，“他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纽约时也曾向很多美国政要询问是否有回到中国的可能性，但最终未能如愿。”冯英祥喟叹。

宋家后人看淡背景

宋家六兄妹中，最早辞世的是小弟宋子安，1969年，62岁的宋子安在香港病逝；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猝然去世，终年77岁；此后的1973年10月，宋霭龄病故于纽约；1981年5月，宋庆龄在北京逝世；1983年，宋子良在纽约辞世；20年之后，宋美龄离世。

宋子安去世时，曹琍璇的先生宋仲虎刚刚从哈佛 MBA 毕业，1982年，宋仲虎和曹琍璇结婚。上世纪70年代，宋仲虎创立了 CrystalGeyserWater-Company，这家矿泉水公司早年曾在加州西岸有75%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美国矿泉水界的元老。如今的宋仲虎正在着手开发一种名为 Peanutmilk(花生奶)的功能饮料，同时还担任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 TripleA 等9家知名公司的董事。

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宋美龄生前，每年3月21日的生日是当年最大的聚会，蒋、宋、孔、陈家族相聚，幸褻

甫太太辜严倬云甚至会率领一个“太太团”从台北赶到纽约为宋美龄祝寿，陈立夫、郝柏村等昔日国民党元老也齐聚纽约。除此之外，宋美龄很喜欢过圣诞节。“我先生宋仲虎是蒋夫人在她侄儿辈中最喜欢的孩子，他有空时常陪着蒋夫人住几天，他们俩之间还有‘昵称’。我们在旧金山的家里有很多蒋公写给我先生的信，比如在照片背后蒋公写着对我先生的思念，‘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孤单一人，非常寂寞，希望你早点回来陪我’，很多人看了很惊讶，想不到火爆脾气的蒋公会写出这么柔情的词句，但诸如此类的几句话完全是蒋公的真情流露。”宋曹琍璇说。

宋仲虎和宋曹琍璇有一男四女共五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今年17岁，读高三。“小女儿的成绩超好，在学校和教会都是领导者，是个完美主义者。她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进到加州的大学，他们几个都是可以躺在沙滩上玩一天的孩子，比如我跟他们讲，把功课做完了你们再出来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躺完了再去做功课。”

对这些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必须理解，他们的 SelfCenter(自我)意愿非常强烈，宋曹琍璇对此深有感触。在孩子年幼时，宋曹琍璇将孩子们送到公立小学就读，为的就是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拥有与左邻右舍小孩嬉戏的童年，直到孩子们上了初中以后，宋曹琍璇才将他们送入私立中学。“在那时，我们才告诉他们，究竟他们来自一个怎样的家族。可是他们完全是美国小孩式的想法，当我第一次跟他们讲 SoongFamily 的背景时，每个小孩子居然都跟我说，‘Sowhat? Itdoesn 'tmatterto me!’(那又怎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

“文革”三大笔杆子的人生结局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力是他写小说时用的笔名。抗战胜利后，王力曾担任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

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〇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娄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8月7日，王力在约见外交部造反派讲话时，鼓吹要夺外交部的权，并将矛头直指外交部长陈毅。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由此，周恩来认为王力不是好人。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注：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谈话，还把王力

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在上海的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意见后，让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下了这样一段话：“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紧接着，周恩来布置召开了一个中央小型碰头会，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将王力和关锋带走“请假检讨”，同时，让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1967年10月，被转交给北京卫戍区。1968年1月26日，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秦城，王力没有被提审过，只是开除了他的党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先被安排在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后迁居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他的口才仍然很好，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关锋：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

关锋原名周玉峰，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他14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岁担任中

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20岁时，因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为关锋。

1955年，中央党校在山东成立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副校长。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为“左派新秀”，很快受到中央的重视和重用。

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并逐渐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关锋成为其中一员，由此，他摇身一变，成为“中央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

关锋在“文革”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并主持起草了“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这一口号造成了极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

然而，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当周恩来找杨成武谈话后，毛泽东就“王、关、戚”的问题做出批示，由周恩来执行，将关锋和王力抓了起来。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由北京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

除。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后来一直住在《红旗》杂志(注：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不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他都回避不谈。2005年春，关锋逝世。

戚本禹：“文革”中“戚大师”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并称为“王、关、戚”。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个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是，却是最活跃的一个。一度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重要权力，在“文革”中被称为“戚大师”。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在上海长大。读中学时，戚本禹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9年，戚本禹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戚本禹年轻(当时只有18岁)，有文化(高中生)，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他平时爱写文章，而且文笔很好。因此，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很受中央一些“秀才”们的注意。

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给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立即在文坛上激起了千层浪，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看到此文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这下子，戚本禹出了名，不久，戚本禹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

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本禹作为《中共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

开这次会议时，田家英已经被解除了职务。按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成为实际掌管中央机要的重要人物，又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因此，戚本禹成了这次会议上被大家注目的焦点人物，并被选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之一。

此后，戚本禹表现积极，曾鼓动红卫兵围攻中南海，鼓动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并冲击宋德住宅。

但是，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于是，毛泽东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

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并没有将戚抓起来，还想争取他一下。因而，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没有动戚本禹。但此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被直接送到秦城监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关、戚”三人被重新审理，王力和关锋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中央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决定起诉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释放后，戚本禹被安排做一点工作。现在，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级职务。据见过他的人说，其精神很好，还是像从前一样，为人处事仍然有一种“戚大师”的味道。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